

电信诈骗已经占刑案比例60%——

一名反诈民警的自述

编者按:据中国警察协会的数据,2024年上半年,诈骗占刑事案件的比例上升至60%,其中,绝大部分是电信网络诈骗。公安部数据显示,2023年1月至11月,国家反诈中心累计下发资金预警指令940.6万条,公安机关累计见面劝阻1389万人次。而在20多年前,盗窃案占全国所有刑事案件的60%。这些数据意味着,中国的犯罪结构已经发生改变。



彭越,2011年成为广东省江门市一名警察,2016年开始进行反诈工作,他目睹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越来越多,犯罪形式和手段也不断变化,全民高风险。彭越说,江门市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占刑事案件的比重,2022年不到40%,2023年逼近50%,2024年末结束,已经稳稳过半。他提到,2023年公安部组织在缅北抓获了5万多名电信网络诈骗嫌疑人,使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减少约三成,但随着犯罪分子的转移,电信网络诈骗仍未根除。作为一名民警,他看着占比不断上升的警情,能做的,是不断延长自己的工作时间。

以下是彭越的讲述:

电信诈骗占刑案比例一半以上

我是2011年进入警察行业的,当时做打击街面犯罪的工作,处理诸如偷摩托车、入室盗窃、抢劫等案件。2016年,我正式开始从事电信网络诈骗(以下简称“电诈”)的防范和打击治理。

我刚入行时,电诈案件还比较少。那时的案件,电

诈犯罪分子大多在境内,我们办理最多的案件是“猜猜我是谁”——诈骗分子打电话给受害人,叫出受害人的名字之后,让TA猜猜自己是谁,无论猜的是谁,他们都会顺着话头,冒充熟人,编造理由借钱。

当时,我们办理电诈案的思路 and 传统案件差不多,以打击为主。我们那时的任务就是抓捕犯罪嫌疑人,经常出差,出差最多的同事一年两百多天都在外面。

我印象里,2020年左右,电诈案件的数量开始有明显上升。当时,整个江门市一天有40-50人报案称自己被电诈金额超过3000元。在我看来,一个原因是新冠疫情暴发后,随着公安机关打击的深入,电诈犯罪分子慢慢转移到境外,疫情期间我们出境变难了,打击工作变得很不好做,工作重心开始向预警劝阻和行业治理倾斜,民警们挨家挨户拍门、苦口婆心地劝大家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

电诈的频繁发生跟一个城市的经济发达程度也有关系。我的感觉和经验里,传统犯罪案件大多发生在比较贫穷和偏远的地方,电诈则是在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占比越高。

打击的困难

我们现在处理的电诈类型可谓五花八门,主要包括虚假投资理财、虚假购物、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或熟人等,而且呈现紧跟当下的时事热点、生活潮流或时间节点的趋势。比如,每逢寒暑假,冒充机票退订客服的诈骗案特别多;开学季,冒充补课的诈骗案特别多;中秋、国庆等节假日,冒充订餐的诈骗案特别多。

一个明显的感受:诈骗类型和场景的复合程度越来越高。比如虚假赌博经常和招嫖诈骗、刷单返利相结合。

随着疫情的结束,2023年年中,公安部重新开始陆续组织出境集中打击。而传统案件固定证据的思维和侦查的思路已经完全不适用于电诈。今年上半年,我们抓获了几十个“冒充孙子诈骗”的犯罪分子,从深挖第一起案件开始到最后收网,总共耗时约一个月。没有运气还完不成。“冒充孙子诈骗”简单来讲就是冒充孙子给老人打电话,取得老人的信任,然后骗钱。这类案件通常是现金交易。“孙子”们让爷爷奶奶把钱放到指定地点,例如埋到草丛,放到垃圾箱里,放在公厕门口,或给指定的人。随后来自全国各地的“车手”(专门负责实施取款并转移赃款的中间人,他们接单,能拿到分成)接单来取,再想各种隐蔽的方法转运。

今年初,这类案件非常猖獗,一上午有四五位老人被骗,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可怕的数量。一宗一宗是处理不完的,要汇总串并所有同类案件——包括通话的时长、次数、手机号的归属地、运营商、诈骗分子的口音等等,发掘他们的特征。我们也追踪了好几个同类案件,接到这类案件的警情,就提前作现场部署,发现“车手”后,组织警力抓捕。其实“车手”是案件中最外围的人,抓他们价值不大,但我们只能追着他们跑,不然没有下一步。

精准需求的捕捉

可能在大家的认知里,老人警惕心比较弱,被诈骗的风险比较高。我最初也这么认为。但在后来的工作中,我们发现,电诈目标的范围其实非常广泛。任何年龄、性别、职业、学历都面临非常高的被骗风险。我们曾想画出受害者的人群画像,但发现受害者是离散分布的,没有固定的特征。江门市去年发生的几起大额电诈,诈骗的是在校的老师。理论上来说,老师具备一定的知识和眼界,但他们也未能幸免。

我感觉,诈骗分子对目标人群特征和人群需求的捕捉越来越精确了。前面提到



的“冒充孙子诈骗”,是一类针对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的电诈。江门是全国第一侨乡,海外江门人和海内江门人的数量是一样的,都是500万左右。整个广东,年轻人在国外的家庭也很多,所以有很多这样的老人。诈骗团伙会先在淘宝上购买一批外国电话卡,然后在不易被察觉或抓捕的地点,对特定区域的固定电话进行“轰炸”。打电话的时间通常是白天,如果家里有年轻人,也都在上班。电话打通以后,只要听到是老人的声音,诈骗分子就说,爷爷奶奶我回来了,过两天来看你。“孙子”诈骗在打电话进行两三次感情铺垫后,会找赌博、嫖娼等理由,说“我被警察抓了,爷爷奶奶快救救我。派出所民警说了,2万块钱就能搞定”。老人对孙子又关切,又思念,很容易相信。

我总结下来,电诈其实只有两大类:逐利型和避害型。逐利型指因追逐利益而受骗,“利”是一种需求,不仅是物质上的,还有情感上的,虚假投资、杀猪盘都属于这类。避害型指为躲避伤害而受骗,冒充公检法、冒充孙子属于这类。

反诈是个无底洞

总的来说,我们反诈中心的工作主要分为案件研判和打击、预警劝阻、反诈宣传、行业治理和人员管控五大类。在我这一级,每天收到的预警数据有一万多条。我们把这些预警信息按照受害者和诈骗分子接触的密切程度分级分类,视情况开展电话或者上门劝阻。整个江门市的反诈警察每天要主动发现超过500名被诈骗风险较高或正在遭受诈骗的潜在事主,约他们来派出所见面,或者我们上门。已经切实发生了损失来报案的,每天还会有十多人。

今年我们的工作重心转向打击,但预警劝阻和反诈宣传的工作一点没少。预警劝阻不容易。2023年电诈警情最高峰的时候,江门一天能监测到400-500人正在遭受被骗风险。我们上门做劝

阻时,获得的回复像是有统一口径:已经转账的说“我没有被骗”,频繁登陆某个网址的说“我没有登录,只是好奇看一看”。这一年,我们开始实行保护性止付(一种防止受害者损失扩大的紧急措施)。根据统计数据,我们实施的保护性止付九成以上都是正确的。

在开展预警工作时,很多事主会觉得我们干预了他们的私人生活,产生较大的情绪波动,谩骂和投诉不在少数。公众的不信任和不在意给我们的宣传和打击带来很大的困难。认清自己被骗以后,甚至有人说,你们警察当时为什么没把我劝住?我们说,都上门劝了好几次,你不相信我。他说我当时正被人骗,肯定不相信你,你应该把我手机收了啊。很像吵架的时候胡搅蛮缠。一开始我们觉得很委屈,不管你有没有被骗,都是我的错。后来就慢慢习惯了,我们认为它是被骗事主必然有的反应,它是一种懊恼羞愧的情绪,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2022年12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正式施行;2023年,公安部组织在缅北抓获了5万多名电诈犯罪嫌疑人,使电诈案件数量在全国范围内减少三成左右。2024年7月26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电诈犯罪分子起到比较大的震慑作用。在我们普通民警看来,这些是里程碑式的事件。

但反电诈这行当是个无底洞。这些工作我们怎么做都做不完,怎么做也做不到位。所以我们工作没有时间概念,累了也不能休息。最近,我的工作强度几何式增加,中秋节我只休息了当天吃晚饭的时间。曹有余

全民反诈
需久久为功

“帮信罪”,这一名词如今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媒体和公众面前。所谓“帮信罪”,即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行为。2015年11月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受到各界广泛关注。

从一些地方检察院的数据看,这个滋生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温床的新型犯罪,案件数量逐年攀升。“在办理的案件中,以购买、使用他人银行卡或出借自己银行卡帮助支付结算、转移资金的情形居多。”常年在反诈一线工作的民警说,涉手机卡、银行卡等“两卡”类帮信犯罪已经形成了“卡农—卡头—卡商—卡贩”的层级模式,黑灰产业链日益成熟。

“当前帮信犯罪手段呈现智能化特点,如使用批量注册软件等技术设备以及虚拟币等手段来实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教授马忠红说,“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犯罪主体呈低龄化、低学历、低收入特征,未成年人、在校学生等涉案人数增多。”马忠红介绍,学生群体缺乏社会阅历,且没有收入来源,很容易被一些“卡头”发布的兼职广告诱骗,成为诈骗“工具人”,有的在自身行为已经构成犯罪时也丝毫没有察觉。

“全民反诈需深入人心、久久为功。”深圳市公安局警察机动训练支队一大队长张洪洁说,治理电信网络诈骗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各方通力合作、齐抓共管、群防群治,才能形成强大合力,有效保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彭景晖